THE BELT AND ROAD

尼泊尔冲突后的社会转型：性别视角

CTS 湖南人民出版社

[英] 普纳姆·卓达夫 著 尹飞舟 李 巍 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总　序

“‘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习近平主席这句话启示我们，“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中国智慧，也需要世界智慧。“一带一路”与世界智慧的关系是什么？在《国外“一带一路”研究译丛》出版之际，这个问题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一带一路”倡议吸纳了世界智慧

丝绸之路是中国开凿出来的古代商路，其形成汇聚了沿线各国人民的智慧，是历史留给人类的财富。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史记》称之为“凿空”之旅。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使丝绸之路复通，《后汉书》记载，班超派遣的“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遣使通西域，《魏书》记载：“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唐宋时期，贸易顺畅，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达到鼎盛，海上丝绸之路也十分繁华，据韩愈《送郑尚书序》描述，“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

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元朝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根据他经行地中海、欧亚大陆和游历中国的经历，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向欧洲展示了神秘的东方。明朝时期，著名航海家郑和 7 次远洋航行，到达亚洲、非洲等地的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驼队和善意”“宝船和友谊”架起了东西方交流的桥梁，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

丝绸之路是贸易之路，将中国的丝绸、铁器、瓷器等带到西方，将胡椒、亚麻、葡萄等带回中国。丝绸之路是文明交流之路，沿线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长期交流互鉴，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交流共融。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的一支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文化。文明因开放而发展，民族因包容而共存，丝绸之路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鸦片战争以后，联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日渐式微，几乎被历史尘封。1868 年开始，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1868 至 1872 年在中国先后作了 7 次旅行，调查地质、矿藏等。在 1877 年出版的《中国：我的亲身旅行及其研究成果》第一卷中，他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1910 年，德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1886—1945）在其著作《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引申了李希霍芬的观点。1913 年，法国汉学家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1936 年，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推出《丝绸

之路》一书。从此，以中国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拂去了历史的尘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

20 世纪后期，国际社会开始出现一些复兴丝绸之路的提法。198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启动为期 10 年的“综合研究丝绸之路——对话之路”项目，旨在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密切欧亚大陆各国人民的关系。2008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和中亚四国政府联合发起“丝绸之路复兴计划”，该计划包括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中国等 19 个国家，于 2008—2014 年实施了 230 个项目，投入 430 亿美元，在公路、铁路、港口、通关等方面着力，构建运输走廊。2004 年，日本提出将中亚五国及外高加索三国定为“丝绸之路地区”，实施“丝绸之路外交”战略，抢占能源。2005 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院院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 Starr）提出“新丝绸之路”的想法，强调建设连接南亚、中亚、西亚的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网络。2011 年，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以阿富汗为中心，将中亚、南亚连起来，构建区域性地缘政治、经济体系，意在围堵和遏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同年，伊朗启动“铁路丝绸之路”计划，旨在连通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的铁路线。2012 年，哈萨克斯坦宣布实施“新丝绸之路”项目，计划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将该国打造为中亚地区最大的过境中心。多年来，俄罗斯将“中欧运输走廊”称为“新丝绸之路”，强调俄罗斯应该在“新丝绸之路”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条走廊从中国、中亚、俄罗斯到德国，联通铁路网和港口。上述这些提法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丝绸之路”蕴藏的智

慧，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找到了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空间和路径，但是它们的价值观存在局限，囿于局部利益和短期效应，没有宽广的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感，因而缺乏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开创性。

2013 年秋，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标志着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主席融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于一体，深邃地思考丝绸之路的历史与未来。他对丝路精神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他针对全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了一个促进各国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积极而广泛的响应，正是因为该倡议具有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吸纳了世界智慧。正如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所说：“‘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点亮的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星空。它将推动跨境乃至跨大洲的融通，惠及世界大多数人口。”

二、共建“一带一路”需要联通世界智慧

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区域联通、世界联通，而世界联通的根本是世界的智慧相通。从时间维度来看，“一带一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倡议贯通古今。丝绸之路从西汉时期开拓凿通到鸦片战争后日渐衰落，再到今天在国际社会共商共建中将重现昔日的辉煌，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虽然历经盛衰，却赓续绵延，其中有多少故事值得回味，有多少智慧值得汲取。2014年6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继承丝绸之路历史遗产的开始。从空间维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联通全球。丝绸之路以中国为起点，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以开阔的胸襟、开放的态度接纳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以开放的态度容纳世界。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合作的需要，结合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走向，“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大走向，一是从中国西北、东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从中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从中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两大走向，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向南太平洋延伸”。在如此广阔的地域空间建设人类利益共享的联合体，在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联通古今，历史和文化聚同；联通全球，视野和利益求同。“一带一路”的共建就是古今中外的智慧联通。

“共建‘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也是中国智慧和世界智慧联通的具体路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

走廊”、蒙古国提出的“发展之路”、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协同共进，是政策沟通的结果，也是智慧碰撞的成效。中国与印尼、老挝合作，加速推进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项目；中国与巴基斯坦、希腊合作，加紧建设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这种设施联通的背后是双方智慧的对接和融合。贸易畅通需要理念的统一、规则的共识，每打通一个环节，都是双方智慧的提升。资金融通汇聚和流动的是货币，挑战的是融资瓶颈，无论是投资还是接受投资，都得依靠双方的沟通、交流。民心相通直面文化和精神领域，促进各国的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这是“五通”中最为重要的，因为“民心相通”使各国人民心意和智慧相通，直接铸就“一带一路”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共建‘一带一路’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助力。”“一带一路”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体现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美好，也带来了困惑。“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中国智慧倡导和为贵、协和万邦，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包容性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富有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包容性全球化强调共商共建共享，追求普惠和均衡，激发世界各国人民的智慧，让世界各国人民因为合作共赢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让世界各国因为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而走向命运共同体。

三、为共建“一带一路”汇聚更多的世界智慧

要进一步吸纳世界智慧，进而联通世界智慧，最佳路径就是从域外视角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域外视角是学习世界智慧的好方法。“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对接各国的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实现共同繁荣。因此，参与共建的各国不能只考虑本国的利益，还要考虑他国利益和区域利益；不能固守本国的理念，还要理解和尊重他国的理念。对于中国来说，就要把中国的愿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愿景相结合，把中国的利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利益相结合。共建“一带一路”要求我们不能局限于中国的视角来看问题，要学会从域外视角、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看问题。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是域外视角，其他国家的政府、商界、学界、民众关于“一带一路”的理解与认识也是域外视角，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对“一带一路”的看法都是我们加深认识“一带一路”的域外视角。通过这些域外视角了解国际社会复杂的观点和诉求，是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必走的一步，深入理解其中蕴含的智慧更是共建“一带一路”所不可或缺的。

2017 年 5 月，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将近 4 年之际，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包括了圆桌峰会和 6 个分论坛，29 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出席，来自 130 多个国家的 1500 多名各界代表参会。与会领导人和代表充分交流，分享政策实践和合作体会，产生了 270 多项合

作成果。2019 年 4 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次在北京召开，圆桌峰会以外，分论坛增加到 12 场，另外还举办了一场企业家大会。这届论坛有 38 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共 40 位领导人出席，来自 150 个国家、92 个国际组织的 6000 余名外宾参会。会议进一步扩大了共识，产生了 283 项合作成果。这两届高峰论坛都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发表了联合公报，凝聚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共识。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供了倾听各国政府声音的场所，要更深入地了解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识，还需要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这就需要了解各国智库的观点，需要了解各国学界、商界、民众的心声，需要了解一些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的看法，还需要了解相关区域和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现状及其对接“一带一路”的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领域展开了“一带一路”的研究，推出了一大批“一带一路”的研究著作，反映了国内研究“一带一路”的热情。但是，国内学术界对国外“一带一路”研究成果的了解不够，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仅散见于论文、著作中，缺乏系统的反映。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各国智库的重视，相关成果已经比较丰富。美国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学会等智库机构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极为关注，它们透过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多棱镜，从不同视角对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关系进行探

讨。尽管美国至今仍置身于“一带一路”之外，而且对“一带一路”的评价常常不怀好意，但是美国对“一带一路”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关注度。俄罗斯的智库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发表了一系列“一带一路”研究报告，态度比较平和务实。印度有多家智库机构如全球关系委员会、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国家海事基金会、南亚分析集团等也都在密切关注“一带一路”，尤其关注中印关系以及两国与南亚的关系发展问题。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瑞典安全和发展政策研究所、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机构、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机构、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院、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中心、加拿大地缘政治监控中心、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哈萨克斯坦战略研究所等数十家国外智库机构也都着眼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世界战略、安全、经济前景研究。同时，各国大学中致力于中国研究的学者也活跃于“一带一路”研究领域，纷纷撰文著书，表达他们关于“一带一路”的观点。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国外“一带一路”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

基于“为国内研究‘一带一路’提供域外视角，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域外智慧”的宗旨，我们编译出版《国外“一带一路”研究译丛》。该译丛选取国外研究“一带一路”的最新著作、论文和研究报告，内容包括国外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看法、国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国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的研究等。《国外“一带一路”研究译丛》的出版，将拓展国内“一带一路”研究的视野，为国内“一带一

路”的研究提供“他山之石”，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助力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www.yidaiyilu.gov.cn）提供的数据，2016年底，有3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到2019年10月，与中国签署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迅猛增加到167个，其中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6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港口、铁路、公路、航空、电力、通信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合作，迅速提升了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成果超出预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保持了强势增长，超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平均水平。截至2019年7月，亚投行成员已经达到100个，其中6成以上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到2018年4月，中国与61个“一带一路”国家共建立了1023个对外友好城市，占中国对外友好城市总数的40%。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共建“一带一路”，是当今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一带一路”建设之所以能够得到沿线各国的共同参与，并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是因为它汇聚了世界智慧的中国方案。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热情参与，联结世界、和平兴盛的丝绸之路必将重现人间。

蒋洪新　尹飞舟

2019年10月于长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译者前言

一

尼泊尔北邻中国，东、西、南三面与印度接壤，是一个地处南亚内陆的山地国家。尼泊尔具有多民族、多宗教、多种姓、多语言的特点，国民中绝大多数信奉印度教，尼泊尔语为其国语，上层社会通用英语。该国江河水利资源丰富，自然与人文景观独特，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却因历史、地理、政治、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

中国与尼泊尔山水相连，睦邻友好，两国之间有记载的历史交往可以追溯到1500多年前。1955年8月1日，中尼正式建交，开启了两国交往的新纪元。1956年以来，中国在公路、砖瓦厂、造纸厂、水电站、纺织厂等项目建设上向尼泊尔提供了一系列经济技术援助。同时，尼泊尔是中国西藏自治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藏尼贸易占到中尼贸易总额的90%左右。尼泊尔在拉萨设有领事馆，是外国在藏唯一的外交机构。1996年，中尼确立了面向21世纪世代友好的睦邻合作伙伴关系。2009年，两国发表《中尼联合声明》，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世

代友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自此以后，中尼领导人在中国-南亚博览会、博鳌亚洲论坛、欧亚经济论坛、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等各类高级别国际会议中频繁接触，沟通良好。迄今，中国已成为尼泊尔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外国游客来源国。尼泊尔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涉藏、台湾等问题上立场明确，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合作。

二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和高度关注。南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地区，尼泊尔与我国在政治、外交、能源、经贸、人文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有利于推动我国与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互通和学术互动。尼泊尔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态度积极务实，中尼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在政策沟通方面，2017 年 5 月，尼泊尔领导人出席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双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为中尼双边关系注入了新动力。2019 年 4 月，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领导人圆桌峰会，进一步加快了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全面深入合作的步伐。在设施联通方面，中尼博卡拉新机场建设项

目、中尼水电站建设项目、中尼巴瑞巴贝引水隧道项目、中尼“三个口岸、两条公路”（樟木-科达里口岸、吉隆-热索瓦口岸、普兰-公路、阿尼哥公路）建设项目等均顺利开展。在贸易畅通方面，作为尼泊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为尼泊尔提供输华产品零关税、博览会免费展位等贸易便利措施，并积极推进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及自贸区建设。在资金融通方面，中国积极支持中资银行在符合有关政策法规的前提下赴尼波尔设立分支机构。迄今为止，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尼泊尔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在民心相通方面，中国政府长期开展援尼人力资源培训和援尼学历、学位教育项目，尤其是在公路铁路建设、医疗卫生援助等方面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解决了尼方燃眉之急，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目前，我国和尼泊尔均处于各自发展的重要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尼泊尔处于政治转型后的适应调整期，两国共同面临着合作发展的新机遇。两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中尼“命运共同体”，合力为当前区域经济及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寻找解决方案，这是开辟中尼关系新局面的契机，也将成为世界各国间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典型案例。

三

本书是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的亚洲系列之女性研究著作之一。作者普纳姆·亚达夫（Punam Yadav）博士是尼泊尔当地人，她亲身经历了尼泊尔社会转型的全过程，现任悉尼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讲师。亚达夫从事性别与冲突研究十余年，在性

别与冲突后转型、性别与社会转型、性别与发展、性别与社会融入、性别、和平与安全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本著作为亚达夫的博士毕业论文。在论文撰写期间，亚达夫为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妇女、和平与安全中心”访问学者。尼泊尔人的身份和生活经历为亚达夫开展尼泊尔性别与冲突研究奠定了基础，为研究所需的田野调查、案例与数据收集等提供了便利。

书名《尼泊尔冲突后的社会转型：性别视角》中的冲突指始于1996年的尼泊尔十年人民战争（1996—2006）。这场人民战争推动了尼泊尔社会在政治、经济、人权、文化、教育、对外政策等多方面的全面转型。在政治制度转型方面，尼泊尔目前已初步完成从君主制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变。在经济转型方面，尼泊尔积极借助外力建设本国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同时开发旅游经济，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经济政策，努力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争取更多自主权。但从目前来看，尼泊尔的经济社会转型还任重道远。

本书中，作者打破了众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所推崇的“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研究方式，对尼泊尔的社会转型研究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重视田野调查和局内人的看法，使本书具有独特的价值。她选取了57名女性进行访谈，这些女性代表了尼泊尔社会的不同阶级、种姓、族群和工作群体。尼泊尔冲突后，她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亚达夫认为，女性从事这些非传统职位的做法违背了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假设，其结果是引发了女性的自身觉悟。女性意识到自己有权力为变革作出贡献，只有提高政治地位、取得经济独立，才能

打破性别歧视，获得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女性还意识到要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变自己，女性只有团结一致才能让女性群体的声音更强大。从女性权利和生活经历的角度分析社会转型是本书的核心。该著作结合女权主义认识论、扎根理论、场域惯习理论等社会学理论探讨尼泊尔冲突后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和社会身份的转型。长期以来，由于受父权制、宗教文化和落后的教育制度的影响，尼泊尔的男女地位严重失衡，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是附庸角色。尼泊尔十年人民战争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机会。战争导致大量男性死亡或是失散，女性不得不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生活，承担起养家的重任，肩负起救国的使命。女性地位的改变带来了国家的文化、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童婚比例在下降，种姓间开始了通婚，女性拥有了参与政治、选择生育和接受教育的权利，等等。

深入了解尼泊尔的政治、历史、文化是深化中尼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迫切需要，本书为我国社会各界了解尼泊尔的国情提供了一个生动具体的视角。

四

本书从翻译到出版经历了一年多时间。为了确保书中社会学专用术语的地道转译，译者大量查阅了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著作及相关的研究文献，确定了“场域”“惯习”“信

念”“实践”“社会性别”等社会学概念的内涵。为了保证尼泊尔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等情况介绍的准确无误，译者广泛阅读了介绍尼泊尔的相关文献，查阅国内外关于尼泊尔十年人民战争的相关报道。书中频繁出现的尼泊尔人名、地名、种姓是翻译的一大难点，译者在检索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久已通行的专有名词直接采用了约定俗成的已有译名，对没有现成译名的采用了音译。对于书中大量引用的当事人的陈述，译者尽量保留体现当事人社会地位和文化层次的语言风格。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书中出现的尼泊尔当地政治团体“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等是尼泊尔特色的政治现象，与我国任何团体或组织都没有关系。2009 年 1 月，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与尼泊尔共产党（团结中心）正式合并，称为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在十年人民战争时期，该政党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推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方针，但其理论阐述和方针内涵与毛泽东思想这一论述的含义并不相同，其中蕴含了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我国主流话语体系下毛泽东思想的所指不能等同。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作了直译处理。

经历了春雨的洗礼和夏日的考验，本书译稿终于在全国人民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的狂欢中杀青。最后，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吴韫丽以及其他为本书翻译出版提供帮助、付出辛劳的同志们。

尹飞舟　李　颖

2019 年 10 月于长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